

【学界往事】

□智效民

十几年前我在研究中国社会学奠基人陶孟和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夫人沈性仁是个不同寻常的知识女性，只是因为资料有限没有继续研究下去。最近翻书，看到金岳霖悼念她的文字，觉得特别感人，再加上近年来又看到她的一些资料，觉得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沈性仁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名叫沈秉钧(号叔和)，此人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时，曾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她的大姐沈亦云是著名外交家黄郛的夫人，沈亦云晚年定居美国，曾有《亦云回忆》问世。胡适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亦云回忆》中有“二妹性仁”一章，对沈性仁有详细介绍。亦云说：“性仁又名景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同过学、共过师，这是母亲的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争则伤友爱，依赖则妨进步。’”寥寥数语，把一位识大体、懂教育的母亲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沈家四姐弟及其配偶在民国历史上都是很有作为的人物。

亦云还说：“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辛亥革命时，“我十八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

【聊斋之爱】

□马瑞芳

传统概念中，女鬼作祟世间男子，让他们丧命。世上断无不害人之鬼，是聊斋基本构思。聊斋女鬼都惦记着逃离阴世、返回人间。她们跟人间书生接触又总会损害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女鬼怎样返回人世，或为人接受？那就靠跟她们打交道的正人君子。刚肠男儿心正，不仅不怕鬼蜮，还能靠人世间男子汉的浩然正气感化女鬼，导引女鬼一心向善，帮助她们走出阴冷、走出邪恶、走向完善。

女鬼聂小倩的使命本来极不光彩，受恶鬼驱使，诱惑杀害人间男子，已害死多名意志不坚定的凡间男子，直到遇到宁采臣。

宁采臣家中有妻子，在男人可以纳妾私婢嫖妓的时代，他凛然宣布“生平无二色”，决不对其他女人动心。美丽的聂小倩毛遂自荐要跟宁采臣相好，宁采臣板起脸好一通臭训：“卿防物议，我畏人言，略一失足，廉耻道丧。”把聂小倩轰出去。不一会儿，聂小倩又拿锭黄金回来，宁采臣立即把黄金丢出去，说：“非义之物，污我囊橐！”聂小倩感叹：“此汉当是铁石。”

美丽是聂小倩崇人的本钱，经受不住美色诱惑跟地鬼混的人，聂小倩摄取他们的血给恶鬼饮用。如果有人不受美色吸引，聂小倩还有第二手，用黄金。而黄金是罗刹鬼的骨

金岳霖悼念沈性仁

遗憾的是，随着沈性仁等人离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变化，这种“贵族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代之而起的是小人得志和暴发户的泛滥。

国，她心细，愿在家事父母……”此情此景，颇有“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况味。

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她早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因父亲生病而回国，转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她与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又名《少奶奶的扇子》)、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学与人常生活》、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沈性仁女士。最近有研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市》。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钱买了一套房子。为了还债，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了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

抗日战争期间，沈性仁与丈夫住在重庆李庄，由于气候潮湿不利于养病，她前往兰州养病，因为她的弟弟沈怡在那里工作。不幸的是她竟然在那里去世，享年48

刚烈男感化鬼婊娟

只要一心向善，邪鬼可以改造成宛如仙女般的活人妻。正是在道德修炼中，聂小倩身上的“鬼性”渐渐消失，人性渐渐唤起。

头，谁接受就被截取心肝。

现在看，聂小倩这两手颇有点现实性、普遍性，某些被推上审判台的高官，某些曾为人民做出贡献、最后却成反贪对象的人，无一例外都过不了金钱关和美人关。封建时代读书人宁采臣铁骨铮铮、正气凛然，顶住美色和金钱双重诱惑，提前三百年，用铁石心肠为如何拒腐蚀做出了榜样。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聂小倩在妖物胁迫下，“以投时好”祟人，宁采臣对她的坚决拒绝和教训，使她看到自己是恶的、丑的、可憎的。向宁采臣和盘托出受胁迫的苦衷，告诉宁采臣：因为他不受美色和金钱诱惑，夜里妖物要派夜叉对付他，同寺的蕪生能帮他免除灾祸。聂小倩还请求宁采臣收拾她的遗骨，运回安葬。宁生在蕪生帮助下从妖物手下逃脱，把聂小倩遗骨掘出，租船带回家，将坟墓建造在自己的书斋外，祭奠道：可怜你的魂魄孤苦伶仃，把你安葬在我的书斋旁，不让你受雄鬼欺凌。

宁采臣祷告完了，聂小倩蓦然白日现身，更加美丽婉约，愿随宁采臣回家，做小妾、丫鬟，无怨无悔。

那么，聂小倩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吗？不，她的自新路还很远。

聂小倩诚恳地向宁母表示：儿飘然无亲，受宁公子救

岁。

沈性仁去世后，在朋友圈引起极大震动，其中最悲痛莫过于著名哲学家金岳霖了，为此他写下了《悼念沈性仁》一文。老金说：当他得知这一噩耗时，“就好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到我稳下来时，又只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我总不大相信电报所说的是真的……”由此可见他们的友谊多么深厚。

紧接着，老金以书信为由谈到对方的才华。他说：性仁给他写的信“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看她的信总是如见其人。有时你也许感觉她连信也起草稿，有时你明知她是顺手写来，可是无论如何信总是那么有条有理。我所认识的朋友中对于事理的辨别能力如她那样大的很少。我常常劝她写论事文章，虽然明知道她是不会写的，因为她另一方面的性格不会允许她写”。

老金还说：有一次我们因



金岳霖

为敌机轰炸谈到了死，我说“我不愿意在最后胜利降临之前死去”，但性仁却没有那种“躬逢其盛”的心理。她认为如果一件事情的结果已经确定，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等它实现呢？这种颇有哲理的想法特别耐人寻味。

作为老朋友，老金还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沈性仁的个性。比如：她虽然是个很单纯的人，但是认识她要费相当的时间；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她怕人，是因为害怕别人给她难堪，也害怕自己给别人带来痛苦；她很雅，却不追求雅，甚至反对雅……所有这些，不就是如今大家所说的“贵族精神”吗？

遗憾的是，随着沈性仁等人离开以及中国社会沧海桑田的变化，这种“贵族精神”早已离我们远去，代之而起的是小人得志和暴发户的泛滥。在这种情况下，贪得无厌的索取和寡廉鲜耻的炫耀，自然就会大行其道。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著有《长袍与牢骚》等书)

子娶小倩，但还是担心小倩是鬼。聂小倩这个比人还精明的小鬼，对症下药给老太太做思想工作。她告诉宁母：公子命中注定有三个光宗耀祖的好儿子，上天不会因为他娶鬼妻就不给他了。宁母相信了小倩的话，跟儿子商量，宁生很高兴，宁家大摆筵席告诉亲戚朋友，众人听说宁采臣娶了鬼妻，要求看看什么样儿，聂小倩华妆而出，众人见其风采，说：哪儿是鬼？分明是仙！

在小说开头，聂小倩很美，是女鬼祟人之美；小说结尾，聂小倩仍然美，也仍然是鬼，人们却怀疑她是仙。从鬼到仙，从恶到善，一念之差。只要一心向善，邪鬼可以改造成宛如仙女般的活人妻。正是在道德修炼中，聂小倩身上的“鬼性”渐渐消失，人性渐渐唤起。蒲松龄用两件事写小倩“人性”的激活和“鬼性”消失，写得十分有趣。一件，小倩刚来时不食人间烟火，渐渐能喝稀粥，再往后，跟常人吃饭无异；第二件，小倩从惧怕蕪生剑袋到主动把剑袋挂到卧室，跟惧怕剑袋的恶鬼彻底划清了界限。而剑袋最终消灭了恶鬼。

在正人君子的帮助下，女鬼聂小倩终于脱胎换骨，修成正果。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如今人们在西安碑林中看到的这块充塞着浩然正气的《官箴碑》，同样是用与其碑文极为匹配的铁骨铮铮的颜楷书写，通碑聚焦着的“公”、“廉”二字，向世人宣扬着一种富有张力的正能量。它像清廉官吏向同事和百姓的公开宣言，又像是公之于众请他人监督的清官自白，其浩然正气，充斥于石碑之外，充盈于宇宙之间，一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又似古人对廉吏的赞颂词。

这块凛然正气的石碑背后，也同样有着一系列凛然正气的故事。这段文字出自明代山东巡抚之笔下，在明清两朝，它曾是

【碑刻漫话】

两任清官铭座右——门大吏续《官箴》

□杨加深

两任泰安知州(府)和一个三代为高官的名门望族的传世座右铭；在现代，它曾被当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总理在1993年的全国分行行长反腐败工作会议上引用；在学术界，它曾受到过史学家周谷城先生的高度关注；在政界，此碑文的微型复印件被整齐地压放在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领导及秘书的办公桌玻璃板下。

这块碑最早出自山东。据考证，《官箴碑》是明代山东巡抚年恭定(名富)撰文并勒石的，从下文中泰安知州顾静祥后来的跋语中可以判断，年恭定当时撰此碑文的目的，是为了警示当时在山东做官的人。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八月，山东泰安知州、贞庵主人顾景祥题跋重刊立碑，并加跋语曰：“右箴言，简而意甚周。昔年恭定抚治东藩时，尝刊行以儆有位者，今贞庵主人乃重刊以自傲。时弘治辛酉(1501)秋八月也。”这也成为最早的《官箴碑》泰安本。从此，这块碑有了用于自傲的座右铭意义。明嘉靖三年(1521)，曲阜郭允礼任河北省无极知县，也曾用颜体楷书书写过此箴以昭士民。这是此碑第一次流传到山东省之外。

后来的故事，则是发生在清代素有“一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之称的连平颜氏家族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下旬，时任泰安知府的颜希深(1729—1780)从旧科房的残壁中发现了顾景祥重刊的石碑，经再刊并跋，立碑于府衙西厢房内。

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颜希深之子颜检(1756—1832)做山东盐政时，收到了泰安令汪汝弼寄来的泰安《官箴碑》石刻拓本，嘉庆二十年(1815)仲秋，时任浙江巡抚的颜检，依照此拓本，重刊并再跋，刻碑于杭州治所大厅的墙壁上。这样，《官箴碑》在山东省外的传播，除河北之外，又扩大到了浙江。

该碑传到陕西西安，则是道光二年(1822)以后的事。嘉庆十九年(1814)，颜检之子颜伯焘(1792—1855)考取翰林，省亲去浙江时，颜检拿出先祖的箴词对他说：“你已入官场，应知做官之理。这既是先人的格言，实也是我家的祖训。”道光二年(1822)，颜伯焘授任榆绥道，颜检又嘱咐他在外做官要随时以箴词自勉。颜伯焘携箴词赴任后，同事争相索取《官箴》手本。苦于当地缺乏雕刻工匠，两年后(1824)颜伯焘将写好的跋文，连同父传《官箴碑》拓本寄给长安知府张聪贤，请其按旧碑拓本重新刻石并立于西安碑林，以便广泛传播。道光四年(1824)十月，张聪贤刻石立碑并再跋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中看到的《官箴碑》石刻和五篇跋文(顾景祥跋、颜希深跋、颜检跋、颜伯焘跋、张聪贤跋)的来历。

一块被传承了几百年的石碑本身，其廉政价值已经极高了。然而碑铭更大的意义，绝不限于几块被传世的石碑，因为从连平颜氏家族的“一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为官经历看，他们的足迹可谓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除石碑的传刻之外，这种廉政风气的言传身教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更应该远远大于上述被传刻的石碑。

几百年来，一块源自山东，流传于河北、浙江，直到进入西安碑林的《官箴碑》，其强调“公”与“廉”的为官理念，被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为官者从西安碑林带到了四面八方。如今，泰安等处的《官箴》刻石多已亡佚，惟刻于西安碑林者岿然独存，在反腐倡廉的今天，这数句令人奋发向上的警世之言，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